

XINSHIQI XIAOSHUO
DE LIUBIAN YU
ZHONGGUO CHUANTONG
WENHUA

张卫中 著

新时期小说的流变 与中国传统文化



Z H A N G W E I Z H O N G Z H U

学林出版社

新时期小说的流变 与中国传统文化

张卫中 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时期小说的流变与中国传统文化/张卫中著. —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0. 12

ISBN 7-80668-023-3

I. 新... II. 张... III. 传统文化-影响-小说-中国-当代 IV. I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1508 号



新时期小说的流变与中国传统文化

作 者——张卫中 著

责任编辑——王后法

封面设计——王 晔

出 版——学林出版社 (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文庙部 120 号)

电话:63779027 传真:63768540

印 刷——上海港东印刷厂

开 本——850 × 1168 1/32

印 张——9.75

字 数——240 千

版 次——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2,001 4,000

书 号——ISBN 7-80668-023-3/1·4

定 价——18.00 元

序

王庆生

前几天,接到张卫中的电话,得知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新时期小说的流变与中国传统文化》即将由学林出版社付梓,作为他的指导教师,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十分高兴。记得三年前,张卫中写信给我要报考博士研究生时,我对他完全不了解,后来读了他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期刊发表的论文,我开始对他有了具体的认识,我感到他对当代文学的理解、领悟、把握的能力是很强的,在他身上充溢着青春的活力和创造的潜力。三年后,他完成了这部系统论述传统文化对新时期小说影响的论著,绝不是偶然的,而是他潜心研究、勇于开拓创新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他多年研究的心血结晶。

张卫中选择中国传统文化对新时期小说流变影响这个课题,是很有意义的。这不仅是一个极有潜力、有待深入发掘的研究领域,而且对于这几年来过于重视西方、忽视传统的倾向也是一个重要的补充、有力的反拨,从而为新的民族文化的构建总结出更多的新鲜经验。作者的这种选择和努力,显示了开阔的学术视野,确定了论著选题的特有意义和价值。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各种思想文化、各种观念形态的总和,是现代中国的一笔宝贵历史遗产。二十世纪以来,门户洞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了全球的巨大变革,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强大冲击。在这种冲击下,任何民族都面临着从传统到现代的变革。就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而言,从梁启超、黄遵宪、谭嗣同、康有为、严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启蒙运动,到陈独秀、鲁迅、胡适等倡导科学、民主,“推倒旧文学,建设新文学”;从“左翼文学”到解放区

文学、国统区文学；从新中国确立的文艺工农兵方向到“文革”时期的文化专制主义；从新时期的思想解放、拨乱反正到九十年代的多元并存、百花齐放……也都经历着从现代到传统的深刻变革，经历着“中”与“西”、新与旧的碰撞和冲突，而在这场变革与冲突中，始终存在着一个如何接受、对待、承续和发展传统文化问题。著名学者罗素在《中国之问题》一书中说：“假如中国人对于西方文明能够自由地吸收其优点，而扬弃其缺点的话，他们一定能从他们自己的传统中获得一生机的成长，一定能产生一种糅合中西文明之长的辉煌之业绩”。著名社会学家金耀基在《从传统到现代》一书中也说，“现代化是中国唯一的出路，”但“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决不是否定传统，而是批判传统，不是死受传统，而是再造传统”。应当说，经过一个世纪的社会、文化变革，经过多次“弃去蹄毛，留其精粹”（鲁迅）的扬弃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落后、衰微、堕失、与现代化不相适应的东西已经或正在被历史所淘汰，而留下那些有生命、有价值的东西仍在生活中发挥着作用，并影响着文学的发展。九十年代以来，全球化已经形成了一股不可阻遏的历史潮流，箝制着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的进程，但是全球化并不是一体化、一律化，更不是要求各国摒弃自己的民族传统、民族个性，相反，它要求各民族承续自己的历史传统、文化传统，在保留自己个性和特点的基础上，寻求与世界的对话和交流，寻求构建适应现代需要的文化格局。有句话说得很好：“现在是过去之幼儿，也是未来的父母。”因此，在当今探讨新时期小说的本土特点，探讨传统文化对新时期小说流变的影响，就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新时期以来，一些有自己独立识见的研究者对这个课题给予了积极的关注，提出了许多中肯的看法。张卫中在研究中也较早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博士在读期间，他在此前已经把握的个案的基础上开始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即以一部专著的篇幅集中考察了中国传统文化——或者说是沉潜在当代社会之下中国文化活的流

脉——对新时期创作的影响;以儒、道哲学为线索对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提出了不少有创造性的看法。

当然作者对这个课题的研究并不是单纯考察“新时期创作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不是一种纯“关系”研究;其着眼点是从传统文化入手,更深入地认识新时期小说,其理论构想是:既然传统文化对新时期小说的发展、演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那么反过来从传统文化入手必然能对新时期小说发展中产生的现象作出更深刻的阐释;以往从政治、社会学角度不能解释的东西可以在文化的剖析中得到认识。从这个角度出发,张卫中在对新时期小说的分析中也确有深邃的感受,独特的发现。

例如对张炜,以往人们谈的比较多的是他作品中的人文主义精神和理想主义色彩,而一旦作者从传统文化这个角度观照这位作家时,其创作个性中潜隐的那种道家文化的内涵就越来越多地显露出来,正如张卫中所述:“他的作品从表面上看显示的道家精神并不是十分清晰,但是如果抓住张炜审视生活的思路作一个反向的探索,可以发现,越是往深处追溯越能看到张炜与道家的相通之处。”在《古船》中,作者紧扣主人公隋抱朴最突出的性格表征“怯病”加以分析,最后找到了他患上这种怯病的根源,就是由于他早年特殊的经历,使他对财富和人间的争斗产生了一种本能的恐惧,于是“知足不争”成了他人生的主要信条,然后作者进一步指出,这实际上是反映了张炜心理中的某种道家观念。作者认为新写实作家池莉的小说中也有一种明显的文化保守主义,其特点就是拒绝理想,认同现实,认同生活的逻辑和秩序,这个特点和道家那种知足常乐、乐天知命是一脉相承的;作者在本书中的分析和举例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再如,本书第五章集中论述了中国传统思维对新时期创作的多方面影响,作者从文化与文学的比较角度,用大量翔实材料,阐释了中西思维在现象一元论与现象、本质二元论上的差异对作家认知与表现方式的影响以及中国传统意向思维

在人物塑造方面的影响,这些论述言之成理,颇有见地。

在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出现了一个从理想向世俗化的转型,此期多数作家放弃了八十年代那种对理想的追求,表现了一种媚俗倾向;在文坛上刚刚崭露头角的一批新生代作家不加掩饰地赞美物欲、性欲和金钱欲,被认为是一种欲望化叙事。那么中国九十年代文坛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转型,以往有人从市场经济转型和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中寻求解释,而张卫中在对中西文化分析后认为,与西方的宗教文化不同,中国文化自身中就隐含了一个世俗性传统;儒家和道家的圣人先哲都认同和注重人的现世生活,不像西方人那样总是把精神寄托放在彼岸世界。因为没有宗教观念的束缚,中国的民众总是蕴藉着浓郁的世俗情怀。因此在历史上只要天下太平、五谷丰登,社会就会涌溢出强烈的世俗欢乐。文化传统对现实总是有强大的支配力和导向性,因此中国社会在九十年代的转型与传统文化中的世俗性特点必然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不是说作者的这个理解是对问题唯一的解释,但这至少可以作为一家之说。

国民性批判也是新文学史上一个保留话题,这个问题乍看起来似乎与本课题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深入思考就会发现:文学是人学,中国作家所写的是中国的人物,而他们身上总是不同程度地浸润了传统文化的影响;这个问题要研究的是传统文化如何影响了新时期小说中的人物,使他们具有了什么样的审美特点,而这种审美特点与整个作品的审美风格有什么样的联系;因此它自然也是研究传统文化对新时期创作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个部分,作者探讨了国民性问题与时代环境的关系、国民性在新时期的新特点等等。例如中国人文化心理中的皇权意识、青天意识、自主意识的缺乏与“文革”中左倾思潮泛滥的关系,在农村,农民的心理痼疾如何导致了他们在建国后干群关系中居于弱势的地位等。其独到之处还在于:作者考虑到引进现代派可能给国民性思考带来

的变化,专门探讨了具有现代派特点的作家其国民性批判的新特点;作为个案分析了残雪和杨争光的创作;指出了现代主义在国民性批判方面的主要优点,即由对生活特殊追问方式带来的较大深度。

总的来说,张卫中的这部专著比较集中系统地考察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新时期小说的影响,立论新颖,视角独特,显示了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学术勇气;作者理论视野开阔,持论公允,对新时期小说中一些重要潮流和有代表性作品所蕴涵的传统文化特点进行了深入的和具体的梳理,令人信服地揭示了新时期小说的文化本源;这项研究无论对于小说创作还是学术探讨,都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当然书稿也有一些缺憾:有些章节的理论概括还嫌不足,对作品的个案分析多了一些;传统文化对新时期小说的影响非常广泛,但本书涉及的毕竟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作家,有待研究的作家还很多,这些都有待作者今后进一步补充、深化。

2001年元旦前夕深夜
写于武汉华中师范大学

当代文学研究的“寻根”成果

——序《新时期小说的流变 与中国传统文化》

樊 星

近年来,文坛上对九十年代文学批评不景气的抱怨时有所闻。诚然,九十年代的文学批评明显不如八十年代那么热闹、那么生机勃勃、那么新人辈出(尽管九十年代的文坛“炒作”手段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了),但是,因此而忽略了九十年代那些具有相当成就的学术成果,也是不实之论。至少在我看来,九十年代已经产生了一批可观的研究成果,证明着学者的事业心没有被“炒作”的喧哗、“玩文学”的油腔滑调所淹没。在这批学术成果中,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深入到揭示现、当代文学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深刻联系,是一股引人注目的思潮。杨义对“中国叙事学”的研究,陈思和对“民间”的发现,李陀对“汪曾祺文体”的评说……都不约而同地显示了当代学人在学术研究上的“寻根”路向。这是九十年代的精神“寻根”。如果说,八十年代的文化“寻根”主要是出于“跨越文化的断裂带”的思考,那么,九十年代的精神“寻根”除了是八十年代“寻根”思潮的自然延伸以外,显然还有更复杂的文化意义:一方面,它是文学批评走向文化评论的必然(发展当代中国文学的文化评论决不仅仅意味着生搬硬套西方的文化评论体系。离开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显然不可能有当代中国文化评论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又是九十年代的中国学者努力在全球化进程中进一步确认自己的民族身份的一个象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张卫中的博士学位论文《新时期小说的流变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出版,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这本

书中,他以开阔的学术视野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新时期小说的影响,证明了传统文化在塑造当代作家的价值观念、当代文学的审美品格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这样,他就为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虽然在他以前,已有一些当代评论家(如季红真、凌宇、陈平原、胡河清等)在研究“现、当代文学与传统文化”方面有了创造性的突破,但他仍然以自己的探索丰富了我们对于当代文学与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系的认识。在我看来,这本书的创见在于:

特别强调研究“传统文化在当代生活中活的流脉”的重要。这是全书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也是最能体现当代文学研究特色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当代作家是怎样在创作中程度不同(有的相当自觉,有的则是“在非自觉的情况下让传统文化渗入了他们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中”)接受了、显示了传统文化影响的?那些影响如何赋予当代文学以深厚的民族特色,同时又显露出怎样的局限性?作者通过对大量作品的归纳、分析,从儒、道精神、世俗传统、思维方式、母语意识诸方面切入,有力论证了传统文化影响的深广。

我很欣赏作者关注“活的传统”的眼光和对作家在“非自觉”状态下“让”传统文化渗入创作的发现。的确,还有什么比传统影响的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更能显示传统的强大?

书中对池莉与张炜在接受道家文化影响方面的相似点的分析是独到之论。众所周知,张炜是当代理想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而池莉则是世俗化写作的代表人物。理想主义与世俗化在人生境界上的差异之大、对立之尖锐,已经在文坛惹出了许多争议。尽管如此,张卫中仍然发现了张炜与池莉的相似之处:二位都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张炜的自然本位思想、人道主义理想与池莉创作中的“安时处顺”、“知足常乐”的倾向都源出道家。这样,张卫中就揭示了理想主义者与世俗化在分歧中有相通之处的辩证法。这样的发现不仅超越了理想主义与世俗化思潮势不两立的时见,而且显示

了传统文化的强大力量——传统能使不同的人生追求在冥冥中殊途同归。

书中关于“新生代小说与世俗性传统”的研究也颇有新意。都知道“新生代”作家充满了激进的“反传统”情绪,但他们实际上反对的只是“温柔敦厚”的传统,而在他们的世俗化追求方面,他们命中注定难以摆脱传统的制约,因为中国文化就充满了世俗化的气息。中国人知道如何“及时行乐”,更善于“苦中作乐”。在这方面,“新生代”作家的“欲望化写作”、“身体写作”既是“新生代”狂欢化倾向的象征,其实也是中国传统小说中以“三言”、“二拍”、《金瓶梅》为代表的市井文学的继续。从这个角度看“新生代文学”,就写出了新意。

此外,从传统思维方式的角度研究新时期小说的特色,也是很能给人以启迪的。作者将评论界已经谈论很多的一些文学现象(如审美特色、叙事模式等等)换了个角度分析,从而使文学风格的研究与思维方式的探讨联成一体,也显示了开阔的思路。书中对于马原创作的分析表明:“新时期先锋作家的现象一元论中也明显包含了中国传统思维的影响”。这样的结论与前述“新生代与传统”的研究一起,共同烘托出一个文化主题:当代文学与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多方面的联系。

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这本书在九十年代的文化、学术“寻根”思潮中,有独到的发现。它开启了新的思路,因此,它的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也许因为成书匆匆,书中的一些思考显然没有得到应有的展开。例如关于“新生代与传统”这个话题,就很值得深入研讨。格非崇拜李商隐(见《智慧与警觉——格非访谈录》,《花城》1996年第1期),他的小说《锦瑟》就来自李商隐;苏童深受《红楼梦》、“三言”、“二拍”的影响(见《永远的寻找——苏童访谈录》,《花城》1996年第1期)。“新生代”诗人中也产生了柯平的《陈子昂登上幽州

台》、《车至剡溪下游突然想起李白》、张锋的《本草纲目》、《南宋茶楼》那样的“新古典主义”现代诗。最近,我还从《大家》2000年第6期上读到了于坚的地域文化大散文《我的故乡,我的城市——昆明记》,其中对昆明历史的追怀也昭示了“新生代”作家“寻根”的足迹……由此可见,对“新生代与传统”的研究除了世俗化的角度之外,还有文学资源、地域文化等方面可以展开。另外,当代作家创作中的“儒道杂糅”现象,书中屡有提及,也未得到展开。在“儒道杂糅”乃至“儒道佛杂糅”的深处,有中国人的灵活处世态度,也有中国思维方式的某种混沌特质,还有作有风格多变的奥秘(例如贾平凹的《商州初录》、《浮躁》与《烟》的风格就很不一样,除了手法的不同以外,也与作品分别接受了道家和佛家的影响有关)。如果能由此深入开掘下去,大概会有更多的创获吧!

我与卫中同窗三年,情同手足。虽然平时都各人埋头于自己的书堆中,但却有许多的共同语言。我也一直关注着当代文学与传统文化这个诱人的话题。现在,卫中的成果出版了,我为他感到由衷的高兴,并祝愿他将这个很有进一步研究价值的文章继续做下去,做出更大的成绩来。卫中希望我为他的这本书写个序言,匆匆中写了上面的话,希望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有兴趣的朋友都来关心这个课题。我想,这也是卫中的希望吧。

是为序。

2000年12月16日于武汉



作者简介

张卫中，文学博士，1956年生于江苏徐州。1982年原徐州师范学院本科毕业，1997年考入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攻读博士学位，2000年毕业。现为徐州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著述有：专著《母语的魔障——从中西语言的差异看中西文学的差异》，参与多部教材的编写；另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语文建设》（香港）等刊物发表论文40余篇。

责任编辑: 王后法

封面设计: 王 晔

封面画: 梁 钢

目 录

序	王庆生 1
当代文学研究的“寻根”成果	
——序《新时期小说的流变与中国传统文化》	樊 星 6
导论 传统文化对新时期小说影响的方式与特点	1
第一章 文化的承续与观念的自觉:新时期小说儒家影响考辨	14
一、简短的回顾	14
二、儒学的人格理想与新时期小说的人物塑造	24
三、生存的韧性与凝聚力:《黄河东流去》的儒家精神	30
四、《白鹿原》:在民族文化主脉上的开掘	37
第二章 知足与不争:道家精神的潜影响	47
一、道家哲学:一种人生观与处世哲学	47
二、知足常乐:汪曾祺小说道家精神阐释	51
三、张炜小说道家精神透视	56
四、来自生活的感悟:池莉创作的文化保守心理	74
第三章 中国文化世俗性传统与新写实、新生代小说的 价值取向	83
一、世俗性与宗教性:中西文化的一个比较	83
二、历史的回顾:中国文学世俗性传统溯源	86
三、新写实小说与世俗性传统	90
四、新生代小说与世俗性传统	94

第四章 新时期小说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新探索	106
一、简短的回顾	106
二、“左倾”思潮与国民性痼疾:伤痕、反思作家 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思考	110
三、农民心灵的曝光:乡土小说关于国民性的新探索	121
四、先锋作家关于国民性的新探索	130
第五章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与新时期小说	156
一、现象一元论与现象、本质二元论:中西思维的 差异及对新时期创作的影响	157
二、意向思维与新时期小说创作	199
第六章 新时期小说对民族形式的继承与创造	225
一、写意:新时期作家普遍的美学追求	226
二、主观化叙事:诗性传统的递传与影响	234
三、表意的策略:避实就虚与删繁就简	242
第七章 母语的认同:新时期小说对汉语本土传统的 探索与开掘	249
一、汉语:本土文化之舟	249
二、文言传统:丰富现代白话文的重要途径	250
三、口语的借鉴:语言本土传统追求的一个向度	257
第八章 新时期创作中方言使用的新特点	263
一、方言:作为一个问题	263
二、新的语境与新的观念	265
三、方言使用的新策略	271
四、新的审美追求与审美效果	279
主要参考文献	288
后记	293

导论

传统文化对新时期小说影响的方式与特点

一

在新时期的文学研究中,“文化”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同时它也是一个内涵丰富、涵盖面相当广泛的概念。美国人类学家克鲁伯与克罗孔在《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检讨》中罗列了从1871年到1951年,八十年间关于文化的定义一百六十四种。^①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认为:“文化是一个综合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的其他能力和形成的习惯。”这一定义,强调了文化所包含内容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从它一开始就存在于人类在懂得利用环境提供的机会上所进行的有组织的开发之中,存在于对集体完成的活动有助的干劲、技能及精神的反应的训练中。”“文化的出现将动物的人变为创造的人、组织的人、思想的人、说话的人及计划的人。”他更注重社会文化功能方面的研究。美国学者C·克鲁克洪认为“文化存在于思想、情感和起反应的各种业已模式化了的方式当中,通过各种符号可以获得并传播它;另外,文化构成了人类群体各有特色的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物的各种具体形式;文化基本核心由两